

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*
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,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是世界唯一的生产丝绸的国家。早在 3000 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,我国劳动人民就已掌握了相当成熟的丝织技术,能够用“斜纹显花法”织成美丽的文绮(平纹组织作底的暗花绸)和用辫绣法绣成多彩的刺绣。到了汉代,我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,中国丝绸远销中亚、西亚和欧洲,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和赞许,尤其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不惜重金进行购买,于是我国便被人们称为“丝国”,而横贯亚洲大陆的贩运丝绸的商路后来也被称为“丝路”,即“丝绸之路”。

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东北的吐鲁番,是古代“丝绸之路”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。从西汉时代起,吐鲁番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,一直是很重要的。公元前 48 年(西汉元帝初元元年),汉朝政府在这里设置了戊己校尉。公元 327 年(东晋咸和二年),前凉在这里建立了高昌郡。“丝绸之路”的兴旺,促进了高昌地区的繁荣。高昌古城(现名哈喇和卓)北郊的阿斯塔那,有一大片公元 4 世纪末至 8 世纪的墓地,埋藏在这里的随葬品中有许多这个时期的珍贵丝织物,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个“丝绸之路”中间站的繁盛景象,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丝绸工艺提供

* 本文原载《考古》1972 年第 2 期,署名“竺敏”。后收入《考古学和科技史》一书(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79)。

了重要的资料。本文介绍的是,最近几年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出土的部分丝织物。

吐鲁番最近发现的古代丝织物中,有一双前凉末年(4世纪后半叶)的织锦圆头鞋,是很难得的。这双锦鞋和东晋升平十一年(367)、十四年(370)的文书同出于39号墓,年代是明确的。鞋帮似乎是像编草履一样编织成的,而不是用织机织成的。鞋长22.5厘米,宽8厘米。鞋尖处的花纹有对狮,沿鞋缘分布有几列小菱形纹和云纹。鞋面有“富且昌,宜侯王,天延命长”等汉文。过去在罗布淖尔的汉代墓葬中,曾发现过类似的锦鞋,^①但不像这一双色泽如新。汉代桓宽《盐铁论》和《汉书·贾谊传》提到的“丝履”^②和曹操《内式令》提到的“杂彩丝履”^③,大概便是这一类东西。唐代也有织锦云头鞋,^④但与汉代的不同。汉代的鞋帮用特别织成(编成)的彩锦制成,而唐代则用普通衣着的织锦剪裁而成。

这次发现的北朝时代(5—6世纪)的丝绸,值得提出的有两件:

(1) 套环“贵”字纹绮。1966年48号墓出土。与义和四年(617)衣物疏等同出。长32.5厘米,宽24.5厘米。“汉绮”组织,即底地平织,经线显花。每平方厘米经线44根,纬线38根。浅紫色。花纹为连套的椭圆环,填以连续雷纹(旋涡纹)、菱形纹和散花,间以汉文“贵”字。

① 斯坦因:《亚洲腹地》(英文,1928),第七章“古代楼兰遗存”。

② 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提到“婢妾韦沓丝履”,又《国疾》也提到“婢妾衣纨履丝”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提到“绣衣丝履”。

③ 见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九七引。《内式令》当为《内戒(诫)令》之误。

④ 例如吐鲁番最近发现的唐大历十三年(778)墓出土的锦鞋,见《文物》1972年第1期,第90页,图二三。

(2) 蓝地兽纹锦。1967年88号墓出土。与延昌七年(567)墓志同出。保存有幅边。长30厘米,宽16.5厘米。经线显花,红、蓝、黄、绿、白五色,但每区只有三色。花纹为一怪兽(夔?)作卷云形,尾部下有一狮形兽和一菱形纹。

套环“贵”字纹绮的花纹,较汉代的文绮复杂,线条也较圆润。而兽纹锦的织法仍是平纹组织、经线显花的汉锦传统,近于卷云的兽纹也有汉代花纹图案的遗韵。但是,这个时候已开始采用波斯锦的斜纹组织纬线显花的织法,花纹也带有波斯萨珊朝的风格,例如鸟兽纹一般是绕以联珠圈的对鸟和对兽,^①与汉代的花纹图案相比较,风格和母题都不相同。

到了隋和初唐时代(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),带有波斯风格的新织法、新花纹的斜纹纬锦出现更多,例如:

(1) “贵”字孔雀纹锦。1966年48号墓出土。与延昌三十六年(596)、义和四年(617)等的衣物疏同出。长18.5厘米,宽8.7厘米。经线每枚双根,每平方厘米25枚,共50根。纬线每副蓝、白、红色各一根,每平方厘米18副,共54根(本文中称复经或复纬同色的一组为“枚”,异色的一组为“副”)。花纹为对孔雀,尾部上翘,外绕联珠纹一圈。

(2) 联珠对鸭纹锦(图版4-15,2)。1967年92号墓出土。与延寿十六年(639)和总章元年(668)墓志同出。长19.8厘米,宽19.4厘米。经线每枚双根,每平方厘米11枚,共22根。纬线四色:黄、白、棕、蓝,但每区只有三色或两色,每平方厘米28副,即不到76根。花纹为对鸭,周绕联珠纹一圈。

但是,在7世纪时,也仍有经线显花的兽纹锦,例如:

^① 例如1959—1960年发掘的303号墓出土的北朝时代的对兽对鸟纹锦,见《文物》1960年第6期封面。

方格兽纹锦。1968年99号墓出土。与延寿八年(631)文书同出。长18厘米,宽13.5厘米。纬线每平方厘米30根。经线五色: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绿,每区仅三色成一副;每平方厘米44副,即132根。保存有幅边,宽3厘米,为蓝色和白色的条纹各一。花纹单位,纬线循环为4.1厘米,即经方向每隔4.1厘米花纹即重复。每组狮、牛、象各一,象颈上有一骑者。

不过就花纹而言,汉锦中的卷云形图案和各兽前后连续的布局法已不见了;兽形比较写实,并且各兽互相分离地孤立起来了,可以说是汉代流利生动的卷云、仙山、走兽等花纹的退化。

盛唐时期(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),吐鲁番地区人口增加,生产发展,它在“丝绸之路”上的地位也就更显得重要了。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盛唐丝绸,品种增多,图案绚丽,反映了当时丝绸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这些丝绸中,保留经线显花的汉锦传统的有:

“王”字龟甲纹锦。1966年44号墓出土。和永徽六年(655)墓志同出。长30.5厘米,宽31.5厘米。经线显花(?)。纬线双线,每平方厘米34根。经线黄、白二色为一副,每平方厘米16副,即32根。花纹单位,经方向每隔5厘米重复,纬方向每隔10.3厘米重复。花纹为龟甲纹,间以汉文“王”字(这件有可能为纬锦)。

另一方面,这时占重要地位的联珠鸟兽纹的斜纹纬锦非常流行,得到了发展。吐鲁番新发现的这种纬锦,可以提出的有以下三件:

(1) 联珠骑士纹锦。1967年77号墓出土。盛唐时期。长13.5厘米,宽8.1厘米。经线每副3根,每平方厘米20副,共60根。纬线每副三色:蓝、绿、白,每平方厘米26副,共78根。花纹为骑士象,外绕联珠纹一圈。

(2) 联珠猪头纹锦覆面。1969年138号墓出土。盛唐时期。锦的周围以平织白绢折绦缝成一覆面。长16厘米,宽14厘米。经线单根,每平方厘米20根。纬线每副三色:红、白、黑;每平方厘米23副,共96根。花纹为野猪头,獠牙上翘,舌部外伸,脸上有田字纹贴花三朵,外绕联珠纹一圈。

(3) 联珠鸾鸟纹锦。1969年138号墓出土。盛唐时期。保留有幅边。长17.8厘米,宽15.5厘米。经线每平方厘米21根。纬线红、白二色为一副;每平方厘米21副,共42根。花纹为一站立的鸾鸟纹,外绕联珠纹一圈。

这三件中,前一件组织细密,花纹精致;后二件组织粗松,花纹野犷。骑士纹的面型属伊朗型,而肩后的飘带则与波斯萨珊朝银盘、银币和石刻上王像冠后的飘带完全一致。猪头纹也是波斯萨珊朝织锦所经常采用的图案,过去吐鲁番曾有发现。这些具有波斯风味图案的织锦,虽然带有外国的情调,但都仍有可能是中国织工所织造的,有些花纹间有汉字,例如过去出土的一件织有汉字“胡王”的牵驼纹锦,可以为证。^① 这些中国织工采用波斯锦新织法和新图案织成的丝织物,是我国当时由“丝绸之路”向西方输出的。这是“丝绸之路”上文化交流的佳例。

盛唐时期和中唐初期的斜纹纬锦,还有两件值得提出介绍:

(1) 晕绦彩条锦。1968年105号墓出土。盛唐时期。长89.8厘米,宽22厘米。这件为锦裙的一部分。经线以红、黄、褐、绿、白分别成行组成,每平方厘米48根。纬线双线,黄褐色,每平方厘米24枚(48根)。纬线提花,在彩条底地上显出小团花。

^① “胡王”锦,见《文物》1973年第10期,第16页,彩色图版壹,2;又《新疆出土文物》(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75),第53页,图82。

(2) 花鸟纹锦。1968年381号墓出土。与大历十三年(778)文书同出。长37厘米,宽24.4厘米。经线双线,每平方厘米26枚(52根)。纬线显花,共有八色,但每区只有三色;每平方厘米32副,三色共96根。花纹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,周围绕以飞鸟、散花等。锦边蓝地五彩花卉带。

晕绸锦的晕色条纹,华美犹如彩虹,又疏疏落落地散布有提花织成的棕黄色的小团花。这种锦似乎是唐代的一个新创造。花鸟纹锦也是唐代织锦中的杰作,它的图案布局紧凑而调和,色彩鲜艳而缛丽,反映了当时织锦技术的高度发展。

汉代丝绢中还没有发现染缬。迄今为止,我们所发现的最早的绞缬绢,是1959—1960年吐鲁番305号墓中与前秦苻坚建元二十年(384)文书同出的一件大红染缬。北朝末年又出现了蜡缬的丝织物。^①唐代的丝绸生产,在这染缬方面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。当时的染织工人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技巧,在染色方法上有不少创造。这次吐鲁番新发现的染缬丝绸,例如:

(1) 绞缬菱花纹绢。1969年117号墓出土。与永淳二年(683)墓志同出。长16厘米,宽5厘米。平纹组织,经纬线每平方厘米36×36根。以浅黄绢(或原为白绢,年久变黄)为坯,折成数叠,加以缝缀,然后先行浸水,再投入棕色染液。染成后,菱花色彩有层次,显出晕绸效果,大方美观。

(2) 树下鸳鸯纹蜡缬纱。1968年108号墓出土。与开元九年(721)调布同出。长57厘米,宽31厘米。平纹组织,经线40根,纬线26枚。纬线分二种,分别以1根或3根为一枚,每种穿梭两次后便改用另一种。淡黄地显白色花纹,图案主要母题是花树下一对相向的鸳鸯,另外点缀一些折枝花。

^① 见《文物》1962年第7、8合期,第71页。

(3) 绿地狩猎纹纱。1968年105号墓出土。盛唐时期。长56厘米,宽31厘米。平织纱,每平方厘米经线24根,纬线42根。纬线分二种,即1根或2根为一枚,每种穿梭两次后改用另一种。花纹部分淡绿,丝线稍散开,底地深绿。图案为狩猎纹,画面生动。

第一件出土时,为绞纛而缝缀的线还没有拆去,可以据以看出当时折叠缝缀的方法。第三件绿地狩猎纹纱,是平织方目纱,比较疏朗,花纹的颜色较底地为淡,花纹部分的丝线松散开以显花。这件“蜡纛”,染色时似乎不是用蜡溶液,而是用含有碱性物质的涂料绘出或印出花纹,并且先行染色,涂料后加,干后再浸水中。碱性溶液溶去花纹部分的丝胶,所以未加拈的丝线纤维散开,颜色也变得浅淡,涂料洗掉后便显出花纹。纱上的狩猎纹图中,有骑士弯弓射兽、骏马奔驰、鹿兔逃窜等形象,又点缀以飞鸟和花卉,画面非常生动,同盛唐时代金银器和漆器上的狩猎图一样,代表了当时艺术的高度水平。汉代花纹的纱罗(花罗),是用两种不同的罗纱组织(leno weave)织出底地和花纹,与唐代这种纛染花纹的平纹组织的花纱不同。

毛主席指出: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,有所发现,有所发明,有所创造,有所前进。”我国劳动人民,在很早的古代便发明了育蚕缫丝和织造丝绸的技术,后来又不断发展和提高,对世界文明做出重要的贡献。这次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,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,对于深入研究我国悠久的丝绸生产历史,有很重要的价值。同时,这些古代丝绸说明了,通过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,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不仅互通有无,进行贸易,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,促进了文化交流;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深远的友好关系,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